

變動與反諷：

朱熹漢賦學的司馬相如論述

許東海

摘要

藉由朱熹晚期《楚辭集註》與《通鑑綱目》為主的重要代表著述，進一步洞鑑其中攸關司馬相如的選錄刪補及其論述，重新加以審視與對讀，並集中關注其中對於漢賦學的經典代表人物司馬相如的品鑒與定位，究竟藉由如何的論述向度及其言說策略，展現其多元視域而獨特深刻的學術版圖與觀照脈絡。

* 許東海現職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緒論：賦學·史學·道學：朱熹漢賦學的馬、揚論述及其文化光譜

司馬相如與揚雄同為漢賦學經典作家，向來也被冠上「辭宗」與「文雄」的文學冠冕，這些主要源自漢唐以來史學家與文論家文化洞鑿之下的正名儀典，然則其中頗值得尋思者，乃在重新藉由史學名著《資治通鑑》的書寫系譜，亦即肇自北宋司馬光迄至南宋朱熹《通鑑綱目》此一續衍與創變脈絡，其中向以「辭宗」與「文雄」冠冕著稱於宋代以前的「馬、揚」，固然主要源自以其漢賦學文學成就享譽歷代士林，然而倘若重新將其置入南宋朱熹以道學範疇系統為中心的學術文化天秤上，並且具體藉由結合其以《楚辭集註》為本的辭賦學著述場域，與其融鑄經史之學的《通鑑綱目》，加以對讀，馬、揚兩人將呈顯出如何互見異同的品鑒取向及其抑揚高下的意圖，其中關鍵誠然又攸關揚雄從東漢以降，臻至唐宋時期，除以「文雄」見稱外，更同時被視為儒家聖學道統系譜中的重要人物，從而深具舉足輕重的崇高地位，相形之下，與揚雄平生自述其賦學先賢典範，即西漢前賢司馬相如之間，朱熹的論述向度，顯然頗見異同，因此有待對照朱熹《通鑑綱目》中攸關司馬相如論述脈絡，重新深加洞鑿馬、揚兩者間的實際論述向度。

其次，朱熹晚年《楚辭集註》及其《楚辭後語》之作的賦學新編，固然遠承東漢王逸，及其宋人洪興祖補註的《楚辭》傳統經典，然而就其近世譜系觀之，更主要源自對北宋學者晁補之《楚辭》學的續衍與正變撰著，若自其表層承傳的面向加以審視，似乎只是歷史的自然演變結果，絲毫不足為奇，然而就其實質的內在重新刊補定著的異同與變動現象觀之，誠然並非單純地出自前後流變的尋常自然典律，反之，朱熹應該是藉由馬、揚及其辭賦辯證題序、考據，甚至篇末跋語等等論述，尤其更藉由結合《楚辭集註》及其《楚辭後語》的賦篇異動與目錄內外及次第之異同，作為其攸關漢賦「辭宗」與「文雄」司馬相如與揚雄彼此品鑒之際的抑揚升降，從而寓寄並體現其中深具《春秋》褒貶意涵的深層論述脈絡與重要意圖。

朱熹針對馬、揚辭賦及其人物的相關論述與品鑒，是否存在彼此抑揚高下之區別，其間誠然攸關朱熹《通鑑綱目》之編著，本源自以《春秋》為經，《通鑑》為緯的傳統論述基礎與學術脈絡，因此如何看待朱熹晚年進一步以《楚辭集註》為中心的馬、揚賦學論述，顯然有待藉由前後兩者之間的對讀與解讀，並且從而得以據此掌握朱熹融鑄賦學、史學與道學於一爐的學術進路，及其馬、揚論述深層意圖，從而展現朱熹平生廣博深邃的學術文化光譜與版圖。

由是觀之，藉由朱熹晚期《楚辭集註》與《通鑑綱目》為主的重要代表著述，進一步洞鑿其中攸關司馬相如、揚雄的選錄刪補及其論述，重新

加以審視與對讀，並集中關注其中對於漢賦學的兩大經典代表人物：司馬相如與揚雄的品鑒與定位，究竟藉由如何的論述向度及其言說策略，展現其多元視域而獨特深刻的學術版圖與觀照脈絡，將可得以由此具體而微略窺宋代學術語境之下，作為漢賦經典人物的司馬相如與揚雄，所映現與呈顯的漢賦學世變系譜及其經典人物之新變構圖，並且攸關漢賦諷頌論述的言說策略，如何在朱熹遊刃有餘的學術著述裡，經由承傳與變創的另類論述脈絡之下，巧變地展開其攸關「變動與反諷」主題意涵的馬、揚漢賦學論述。

至於其中朱熹圍繞揚雄辭賦及其論述的詮讀，本人另有專文加以商榷，唯此二者既彼此相涉，卻也別具區隔，因此本文關注與撰述的焦點，主要聚焦於漢代賦聖司馬相如身上；此外，本文探索的重心，乃是藉由朱熹晚年相關的辭賦學著述《楚辭集註》與《楚辭後語》等等系列的文本論述，並結合其史學重要著述《通鑑綱目》，作為本文論述的文本依據及其涵蓋焦距，至於其它涉及朱熹本身之生平及人物評價的相關商榷，讀者自各可旁涉參酌與研讀，然則諸如此類誠非本篇主要命題旨趣及其論述焦點範疇之所在。

二、繼踵與變動：朱熹《楚辭集註》系列所見司馬相如等人辭賦的變動與出入

朱熹晚年所撰《楚辭集註》及其〈楚辭辯證〉、《楚辭後語》，誠然乃是繼踵東漢王逸《楚辭章句》與北宋洪興祖《楚辭補註》之後的《楚辭》重要代表注本，成為體現《楚辭》學從漢學轉向宋學的重要關鍵及其學術里程碑。¹其中《楚辭後語》部分，據朱熹卷首目錄敘論所揭，乃是根據晁補之《續騷》與《變騷》二書所刊補定著而為五十二篇，並且基於針對晁氏舊刊辭賦選錄及其標準尺度上的不足與不是之認知基礎上，重新予以增刪改訂而成，其中關鍵理由，據朱熹自敘謂：

晁氏之為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²

由此觀之，朱熹此作乃是基於辭益精與義益嚴的兩大要旨，重新加以刊補定著，其中晁書舊本中相關辭賦的選錄與刪補，倘若就上述朱熹新刊目錄

¹ 參見蔣立甫校點：《楚辭集註》，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5。

² 〔宋〕朱熹：《楚辭後語·目錄》，收於蔣立甫校點：《楚辭集註》，頁220。

的自敘加以審視，誠然應是在晁補之「主於辭」而「兼於義」的辭選錄基礎上，益加精益求精，從而展現其披沙揀金的辭賦鑒定水平，然則倘若從其實際「刊補定著」的新編目錄觀之，顯然並非如其自述，純然只是在晁氏舊刊的觀照基礎上，更加嚴審的單純選錄向度，其中儼然頗不乏體現出此書承傳之外意圖翻轉的辭賦觀照向度及其明顯置換。

其中朱熹《楚辭後語》雖將舊本中揚雄辭賦芟刪殆盡，卻絕無僅有地置換為揚雄〈反離騷〉一篇，然則此一表象看似朱熹雖刪除晁氏舊刊的〈羽獵〉等二賦，卻猶代以〈反離騷〉一篇作為揚雄續衍〈離騷〉書寫系譜的具體示現，然則若進一步檢視朱熹分別在〈楚辭辯證〉及《楚辭後語》二書，針對揚雄〈反離騷〉所撰寫前序及後跋的相關論述，則不難洞鑒其中主要出之「選錄」與「貶黜」相互定義的刊定編纂策略，及其攸關《春秋》經典的褒貶義法。以上大體為朱熹晚期著述《楚辭集註》之中，與北宋前賢晁補之《續騷》等書的主要出入所在。其次，朱熹新編更易意圖尤為顯著之例，也在針對揚雄辭賦的芟刪與翻轉，其中揚雄〈甘泉〉、〈羽獵〉等賦，向為漢魏以下，迄至唐宋文士閱讀的重要漢賦經典之作，晁氏既因此選入舊編之中，然而朱熹重新刊定之際，卻斷然予以刪除。

至於朱熹《楚辭集註》、《楚辭後語》等著述，本是源自對於北宋前賢晁補之《續騷》等書中，攸關司馬相如的辭賦編目，誠然別具殊異之觀照，因此其間固自不乏增刪定著之處，據今傳朱熹著述，其中主要刪去晁氏所錄〈大人賦〉，從而代以司馬相如另一篇〈哀秦二世賦〉，同時又保留晁氏原已編錄的〈長門賦〉，此中增刪芟補的主要關鍵，倘據朱熹本人在《楚辭後語·哀二世賦》題序所稱：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如此。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辭》，〈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太甚，然亦終於諛也。特此兩篇為有諷諫之意。³

以上乃是朱熹《楚辭集註》、《楚辭後語》等著述裡，對於漢賦兩大經典代表人物司馬相如與揚雄的變動與選錄，基本上體現出朱熹漢賦學世界中耐人尋味與深入探索的重要變動線索及其脈絡，因此倘若重新藉由他在學術生涯晚期所撰述的漢賦學與歷史學著述，加以對讀，作為深入凝視與開展詮釋的另類研討視域，應可在朱熹漢賦學與歷史學，甚至於攸關朱子道學的博大學術基礎上，重新勾勒其中代表賦家司馬相如等人，從中所映現而

³ 參見〔宋〕朱熹：《楚辭後語·哀二世賦》，頁245。

出攸關漢賦經典與宋代賦學二者，彼此交集與對話的另一道賦學風景及其文化光譜。

三、辭宗與諷頌：朱熹《通鑑綱目》的司馬相如論述及其褒貶向度

朱熹的揚雄貶黜論述，其中誠然涵攝儒學道統的品鑒取向，然而無可置疑地從其融鑄《春秋》義法於史書《通鑑綱目》，臻至其後以《楚辭集註》為主的賦學論述，朱熹筆下的揚雄，無論就其人物抑或辭賦角度，皆殊途同歸地指向貶抑與揚棄的論述境遇，然則倘若執持統一裁鑒尺度，則略可窺見朱熹對於漢賦辭宗司馬相如的定奪，其中雖亦不乏商榷亦或責訐的意見，基本上則呈顯出得失互見而兼具褒貶的局面，至於《通鑑綱目》中的司馬相如，究竟以何種賦家形象及士臣身段出現在朱熹深具《春秋》基調的史學舞台上，從而展露其在漢唐文化史上「辭宗」與「文雄」之外的士臣精神寫照？誠為司馬相如在朱熹《通鑑綱目》的重要文化身影，進而將成為司馬相如「辭宗」系譜在朱熹賦學觀照之外，另一攸關史學與道學意涵的宋代人物寫真重要示現，亦復成為與《楚辭集註》及其《楚辭後語》前後交差對讀的重要具體文獻依據。

朱熹《通鑑綱目》中關涉司馬相如的前後載敘，誠然並不多見，並且散見於其綱目行文之間，此一文本客觀現象，相較於揚雄之死的《春秋》筆法，並且特予高調揭示的精神態度大異其趣，並且全書幾乎不見朱熹對於揚雄仕宦經歷相關論述，其中具有任何關涉於諫臣意識及其身影，更遑論其《通鑑綱目》所附揚雄傳記，主要內容雖亦擷取班固及司馬光等人的載紀，然而參照其所撰《法言》與〈劇秦美新〉相關的新莽頌德為「君子病焉」的裁鑒取向，顯然在態度上呈顯出並不苟同，進而乃於其綱要高揭「莽大夫揚雄死」之下所蘊含的《春秋》貶黜大義，從而攸關朱熹《楚辭》賦學論述與《通鑑綱目》二者聯袂演繹的「賦家與諍臣」旨諦。

朱熹《通鑑綱目》之撰，誠然借鑒聖學《春秋》義法為其深層旨奧所在，從而在宋代士林即已出現此書猶如一本《續春秋》的聖學經典續衍，例如李方子於宋溫陵刻本《資治通鑑綱目·後序》即謂：

今《綱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於夫子。至若曲筆亂紀，隱匿匿情，有先儒之所未盡者，悉舉而大正之。……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開歷古之群迷，極經世之大用，謂之《續春秋》，亦何媿焉！⁴

⁴ 參見〔宋〕王柏：《資治通鑑綱目·凡例後語》，收於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

由此觀之，朱熹《通鑑綱目》就其深層學術旨諦，誠然體現其作為《春秋》續衍的宋代道學觀照視野，然則就其撰述的命名取向而言，則顯然乃應歸屬於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書寫譜系，二者互為表裡地締構出朱熹《通鑑綱目》的續衍經緯與論述脈絡，同時亦復與其《楚辭集註》等著作，既是承傳續衍王逸、洪興祖《楚辭》舊註，及近世前賢晁補之楚〈騷〉系列，同時又重新加以刊補定著的新編旨趣，彼此若合符契而前後輝映。

至於《通鑑綱目》攸關司馬相如的載敘，其中旨要之一，即為相如面對漢武帝的士臣諫諍事實，例如朱熹於「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敘列綱目，首以「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⁵開宗明義，注文更大肆載敘史傳文獻中攸關董仲舒的《春秋》論述，並且於文末特加援引程子之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及「漢之諸儒，唯董子真儒者氣象。」⁶作為朱熹推尊董仲舒在漢代儒學上無可取代的歷史地位，其中學術關鍵固然在其《春秋》之學的卓越成就，同時亦復進而成為朱熹對於東漢與北宋以來，視揚雄為孔子聖學道統之後尊高論述的另類反撥與「刊補定著」。

朱熹《通鑑綱目》誠然藉由以「莽大夫揚雄死」的《春秋》貶黜及其千秋功過論述，水到渠成地成為其《楚辭集註》藉由借鑒綱目的標榜條目，及其卷次內外分際的尊抑品第，體現其承傳晁氏舊本，而又刊補定著的異同是非商榷；相形之下，司馬相如固然於朱熹《楚辭集註》等書之中，並未受到唐代前後並稱「文雄」的揚雄如是之升降揚抑待遇，然則如前所述，即使朱熹對於宋代士林已享有「賦聖」的尊崇與推譽，對於其文學成就依然褒陳並見，適如司馬相如於其《通鑑綱目》固亦不乏援引前賢史傳觀點，視為賦聖與諫臣二者兼美的仕宦風軌，例如武帝建元三年九月，綱目所見文字：「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⁷的標目，其下箋注，即據班固、司馬光等撰相如史傳的文獻，其主要敘錄「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如司馬相如、東方朔等等一時俊異的諫諍言論，其中「相如特以辭賦得幸」，並以東方朔「時直諫，有所補益」，而東方朔雖因此拜官太中大夫、給事中，武帝依然構建上林苑。朱熹其下即引司馬光《資治通鑑》所纂史事加以擷錄彙括。基本上由此得以映現司馬相如以賦家之名，行其諍臣之實的文學身影。⁸

子全書》，頁 3501-3504。

⁵ 見〔宋〕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卷 4，頁 253。

⁶ 同上註，頁 258。

⁷ 見〔宋〕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卷 4，頁 260-261。

⁸ 參見拙文：〈仙境·夢境·困境：從〈諫獵疏〉到〈大人賦〉看司馬相如的諫臣焦慮〉，《第九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14 年），頁 33-50。

至於《資治通鑑》攸關司馬相如依違於諛臣曲意與諍臣直諫的貶抑論述，若從武帝封禪泰山，而相如又於臨終之前寫就勸頌漢武帝的〈封禪文〉一事觀之，朱熹所撰《通鑑綱目》似乎並未顯見其後所撰《楚辭後語·哀二世賦》題序所揭，其〈封禪文〉全然盡失諍臣風軌，而為「阿諛取容」之態，然則藉由朱熹與其前賢司馬光《通鑑》前後書寫譜系的對讀，仍然足以略窺其中消息，按司馬光《資治通鑑》雖於漢武帝在位政績及其治道舉措頗置危辭，並將其上比秦始皇，惟其「曲終奏雅」則又假以辭色，頗見緩頰，謂「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守統守，受忠直之言，……好賢不倦，……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⁹倘若由此對照於朱熹《通鑑綱目》之文本，固自援引前述司馬光論述，加以櫟括取捨所成，惟其所敘有關封禪泰山之大事，基本上固自以司馬光為底本，却不無藉由字句刪芟，映現其《春秋》褒貶義法的中心旨趣。

朱熹《通鑑綱目》之於《資治通鑑》的司馬相如書寫轉捩，主要有二，其一乃是將《資治通鑑》所敘：「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櫟括而為「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上泰山」。司馬光舊本原作「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兩處文字刪去，又另芟除「請方士又言」一段，推朱熹省文之原由，就其文意所涉其中應不乏對於司馬相如之不僅未如前述展現諫諍或諷諭職能，甚至出之以反其道而行的「阿諛取容」姿態，此事與《楚辭後語·哀秦二世賦》題序，適成互為表裡的對照論述，並且互見隱顯及其《春秋》筆法的異同分別；至於方士之言，更顯然違忤其聖人儒學道統的學術分際，固當為朱熹所揚棄。

其次，《通鑑綱目》司馬相如論述尤堪玩味者，乃在《資治通鑑》的評述固然與《通鑑綱目》繁省異趨，然而朱熹却去蕪存菁地獨取「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以資作為對於漢武帝論述的非儒之失，其中固應深具儒學道統與政統之際商榷及其反諷意涵。¹⁰至於對於漢武帝的封禪大舉，更特加揭櫫其「帝自製封禪儀」的綱目，然則封禪儀典本為歷代儒臣的重大禮學議題，而漢武帝乃順水推舟地依據內史倪寬諛諂之說，出以自擬，完全不顧諸儒臣之商議，作為其論述策略上互文見義的歷史依據。

朱熹異於《資治通鑑》的轉捩關鍵，誠然正是將司馬光之漢武帝論述中的另類斷章取義，並且從《春秋》義法上，針對其中「盡罷諸儒不用」與「自製封禪儀」之離經叛道之舉，視為武帝互為表裡的君道嘲諷，並因此更將「帝自製封禪儀」之史實載敘，特予揭櫫於犖犖的綱目文本，以資

⁹ 參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卷22，頁20。

¹⁰ 參見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84-112。

體現朱熹對於漢武帝的歷史洞鑒定位於司馬光所謂「孝武窮奢極欲，繁形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感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的君王失道面向，¹¹而無關前述司馬光對於武帝「尊先王之道」又「好賢不倦」及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的另一側面，然則朱熹如是的裁奪判定，顯然更與漢代史家班固《漢書》中，「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建封禪，禮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體現「武帝之雄才大略」的歷史評價，彼此絕然背馳而扞格難入。¹²

由上觀之，朱熹固然藉由其《通鑑綱目》中漢武帝封禪泰山中重要史實，進行其對史學前賢班固及司馬光的重新商榷，甚且顛覆的論述取向，並且亦復通過武帝封禪的綱目揭櫫，作為貶抑嘲諷漢武帝好大喜功與窮奢極欲的歷史貶抑及其《春秋》大義，甚者朱熹此一攸關武帝封禪的綱目論述，同時藉由其中關鍵人物司馬相如「病且死」之際的〈封禪文〉的初始勾勒，作為其書鋪陳漢武帝日後封禪泰山大計的初始倡議根據，因此朱熹既以《春秋》義法之筆，標舉漢武帝封禪舉措的荒謬行徑及其叛道離經，然則由此得以推知司馬相如之〈封禪文〉，不僅在朱熹眼中實屬「阿諛取容」，從而悖反儒家君子之道的，甚至儼然成為武帝封禪之惡的始作俑者，從而映現對於漢武帝君臣封禪之舉的《春秋》貶抑及其道統諷諭。由此觀之，朱熹《通鑑綱目》司馬相如論述的中心意義，誠然主要聚焦於司馬相如在武帝時期「賦聖」與「諍臣」兩種文化身分的依違實際，以及由此體現《通鑑綱目》司馬相如賦家與諍臣論述的褒貶互見。

四、賦聖與諍臣：朱熹辭賦學的司馬相如論述及其人物品鑒向度

朱熹《楚辭後語》異於晁氏舊著新增的司馬相如〈哀二世賦〉題下注文，有一段重要的相關論述：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如是。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子虛〉、〈上林〉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詞，〈大人〉於〈遠遊〉，其漁獵又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此兩篇（按指〈長門賦〉及新增〈哀二世賦〉）¹³為有諷諫之意，而此篇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

¹¹ 參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22，頁20，「臣光曰」一段。

¹² 同上註，「班固贊曰」一段。

¹³ 〔宋〕朱熹：《楚辭後語·哀二世賦》，卷2，頁5，「題序」。

迴局促而不敢盡其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知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而言哉？¹⁴

朱熹《楚辭後語》相對於晁補之舊編的司馬相如〈長門賦〉，固然不無以「此文古妙最近《楚辭》」的重要理由，然則其中更為關鍵者，恐在其深具屈〈騷〉諷諭之旨，故其題注又援「歸來子曰：『此諷也，非〈高唐〉、〈洛神〉之比』」¹⁵，而不專以蕭統《文選》所載陳皇后千金買賦為意，反而更傾向於相信司馬相如出於主動為文諷諭武帝之論，所謂「或者相如以后得罪，自為文以諷，非后求之」。

由此觀之，朱熹將晁氏原編中司馬相如辭賦之更動重訂，主要著眼於諷諫旨諦的判準；至於沿襲晁氏舊例的〈長門賦〉，依朱熹於〈長門賦〉題解小序所述，則是歷歷援引晁氏與《昭明文選》之說，闡釋其中諷諫之義：

歸來子（晁補之）曰：「此諷也，非〈高唐〉、〈神女〉之比。」
梁蕭統《文選》云：「漢武帝陳皇后，……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¹⁶

朱熹題序甚至依據班固《漢書》所載文獻史料，進而推論其史實之原委可能，唯其中始終不易者，則在裁鑿〈長門賦〉深具辭賦諷諭的楚〈騷〉古詩旨趣：

而《漢書》〈皇后〉及〈相如傳〉無奉金求賦復幸事。然此文古妙，最近《楚辭》。或者相如以后得罪，自為文以諷，非后求之，不知叙者何從實此云。¹⁷

據朱熹所述，司馬相如〈長門賦〉、〈哀二世賦〉既經其「刊補定著」，視為諷諫之賦，然則就前引朱熹所論，司馬相如經典名作如〈子虛〉、〈上林〉等賦，早與〈長門賦〉皆為蕭統《文選》所編目選錄，晁氏基本上繼踵《文選》遺緒，編進《續騷》之林，朱熹則反其道而行地斷然加以刪芟，而其主要理由，則在：

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大人〉之於〈遠遊〉，……然亦終歸於諛也。¹⁸

¹⁴ [宋]朱熹：《楚辭後語·哀二世賦》，卷2，頁5。

¹⁵ 參見[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辨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45。

¹⁶ 參見[宋]朱熹《楚辭後語·長門賦》，頁243。

¹⁷ [宋]朱熹《楚辭後語·長門賦》，頁243。

此外，朱熹論述之尤堪玩味者，更在既以〈哀二世賦〉的諷諫大蠹，取代晁氏舊編中〈大人賦〉的辭宗經典選錄，同時却又頗不乏微辭指陳其諂諛之意：

而此篇所為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迴局促，而不敢盡其詞焉，亦足以知其阿諛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為言哉。¹⁹

由是觀之，朱熹對於漢唐以來見視為「辭宗」與「文雄」的司馬相如及其辭賦，顯然褒貶互見，其中朱熹既承認其殆為賦家之聖的地位，²⁰却又往往藉由君臣之道及其攸關君國天下治亂的史學視域，進而裁鑒其賦家身分之外的諍臣職責，從而體現其賦學與史學合流，甚至承傳儒家聖學中政統與道統交相競合的學術判準，並由此呈顯上述他在司馬相如〈哀二世賦〉題序中的論述向度及其深層思辯的文化理路。

至於以「辭宗」、「文雄」著稱的司馬相如，其在賦學史上的成就，甚至為南宗道學家林朝光推美為「賦聖」，朱熹本身亦曾援引其說，並且從其下文的賦學論述，也不見任何貶抑文詞，基本上應可視為朱熹於其賦學之聖的當代如是觀照。至於朱熹《楚辭後語·哀秦二世賦》的「阿諛取容」的負面論述，倘若暫時勿論其中攸關漢代賦家的創作策略的文體特性問題，²¹從朱熹該段題序的基調而言，乃是出之以「賦家與諍臣」此一論述宗旨的商榷結果，易言之，其內在深層學術意涵，正是源自賦學與史學二者融合互涉的此一重要學術主題思辯，並且更深切攸關其另一重要著述《通鑑綱目》裡的君臣綱紀與諫臣旨義。

五、結論 變動與反諷：朱熹漢賦學的司馬相如論述及其學術文化構圖

藉由上述朱熹《楚辭集註》及其《楚辭後語》中的司馬相如與揚雄的辭賦學論述，及其在《通鑑綱目》融合《春秋》義法與歷史鑑戒的刊補定著，大體得以略窺朱熹對於漢賦辭宗司馬相如，及其另一「文雄」後學揚雄，涵攝孔門「文學」與「德行」兩大儒學科目的重新裁鑒，並且於此體

¹⁸ 參見〔宋〕朱熹：《楚辭後語·哀二世賦》，頁245。

¹⁹ 同上註，頁245。

²⁰ 參見〔宋〕朱熹：《朱子語類》（臺北：中華書局，1968年），卷139，頁330。朱氏引南宋理學家林艾軒（林光朝）之語謂：「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

²¹ 有關漢賦的書寫策略與其表現手法，可參見簡宗梧：《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現朱熹融合賦學、史學與道學的論述跨度，及其博大宏通的學術版圖，並沿此形塑漢賦經典作家馬、揚在以儒家道統為中心的宋代道學學術思潮中，以集大成著稱代表人物朱熹的學術觀照之下，究竟呈顯如何具體而微的「辭宗」與「文雄」賦學經典人物寫真。

朱熹晚年刊補定著《楚辭》系列中的馬、揚論述，不僅在抑揚褒貶的取向上，應是大力借鑒前此所撰《通鑑綱目》的內在《春秋》義法，及其攸關儒學道統君臣綱紀等等命題，從而體現朱熹馬、揚論述背後，攸關賦學、史學臻至道學的深層文化意涵；其次，倘若就其書寫譜系面向而言，也是出之以承傳為名，以變創與翻轉為實，並以「變動與反諷」主題為核心所展開的一場宋代攸關馬、揚漢賦及其人物論述，並且如是的的精神旨締與書寫策略，也因此躍然體現在《楚辭集註》及其《楚辭後語》等著述之字裡行間，及其相對於北宋前賢晁補之以楚《騷》續衍及其嬗變為題的《續騷》與《變騷》二書，其中饒富興味者，則又呈顯在朱熹藉由其賦學與史學著述之彼此前後論述，臻至書寫文本之間的另類跨越對話，開展並呈顯其深具漢賦學「變動與反諷」語言傳統及藝術特色的論述精神，進而構建出宋代辭賦學深具「變動與反諷」論述精神意涵之一重要系譜與光譜。

至於朱熹的馬、揚論述，主要藉由其賦學與史學相關著述的跨越與對讀，並且二者儼然由表層語言迄至內在精神上，呈顯出彼此隱顯互證而又互為表裡重要論述脈絡與對話意涵，其間既見交集，又復不乏異趨，從而成為朱熹以漢賦辭宗與文雄司馬相如、揚雄二人為名，同時以其辭賦學與經史學為實，彼此經緯交織與連袂演繹的朱熹論述意圖與學術版圖，並且倘若就其學術進路而言，不僅成為一幅深具朱熹學術思潮的馬、揚人物及其漢賦學論述，並且亦復攸關宋代漢賦學「世變與經典」對話意涵的重要文化構圖。

徵引文獻

專著

-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 〔唐〕韓愈：《韓愈集》，湖南：岳麓書社，2000年。
- 〔宋〕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通鑑綱目》，臺北：商務印書館，1987年。
- 〔宋〕——：《楚辭集注》，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宋〕——：《楚辭後語》，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宋〕——：《資治通鑑綱目》，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宋〕晁補之：《雞肋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
- 曾棗莊等編：《全宋文》，四川：巴蜀書社，1994年。
- 踪凡：《漢賦研究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簡宗梧：《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余英時：〈道統與政統之間〉，《士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李祥俊：〈北宋諸儒論揚雄〉，《重慶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
- 許東海：〈仙境·夢境·困境：從〈諫獵疏〉到〈大人賦〉看司馬相如的諫臣焦慮〉，《第九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2014年。
- 郭焜：〈揚雄身分角色的歷史轉換〉，《蜀學》第7輯，2012年。
- ：〈從宋人關於揚雄仕莽的爭論看忠節觀念的強化〉，《四川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 郭建勳、楊賽：〈晁補之辭賦學論略〉，《中國文學研究》2015年第3期。
- 劉真倫：〈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與朱熹《楚辭後語》比較研究〉，《文學遺產》2012年第2期。
- 劉躍進：〈西道孔子·世紀鴻儒：揚雄簡論〉，《中華文化論叢》2019年第4期。